



阿哈湖古墓碑(资料图片)



阿哈湖(图源:《南明年鉴》)

阿哈本无湖。贵阳的湖,多是“高峡出平湖”,在峡谷山间筑坝蓄水而成,是“湖”也是“水库”。据《贵阳史话》,筑城市区内有湖百余处,大型如红枫湖、东风湖、百花湖;中型如花溪水库、松柏山水库、红岩水库;小型如汪官水库、杨眉水库、小河桥水库,莫不是筑坝成湖。阿哈湖也不例外。此处位于苗岭山脉中段,贵州高原的台阶上。自海西运动和新构造运动以来,地壳经过强烈的变动及长期风化剥蚀,形成低中山丘陵为主的山原地貌。湖区周围山地最高海拔1341米,最低海拔1064米,5条水源穿流并汇集在山间的河谷地带。据《贵阳市志·城市建设志》记载,5条水源分别来自金华、阳关的沙河,蔡冲的平桥沟、麦坪、久安的鱼鱼河,烂泥沟和猪场坝沟。后3条不平时于涸。1958年,市政部门为解决贵阳用水问题,在小车河上游,海拔1110米以下的谷地(阿哈寨、凯龙寨一带)筑坝蓄水,水库于1960年竣工,取西岸的“阿哈寨”之名而称“阿哈湖”。小车河下游的河岸平坦成为阿哈湖淹没区域。

据说“阿哈”二字系布依语的音译,有相邀出游、相聚快乐的意思。阿哈湖未形成前,那一带以它美丽的风光吸引了居住在附近的布依族人民。每逢传统节日,布依族青年男女便隔山隔水地相互拉长声音相约,结伴在山林水滨跳舞、对歌。

成湖后的阿哈湖,东起南郊白龙洞,西至久安雪厂村,南接金家山、轿子山,北抵画眉山、笑天龙;分为北湖、南湖和中湖3个湖区,湖中有大小37个岛屿,随着水位涨落时隐时现,形态各异,幽深神秘。另有7个湖汊,置身其间有如进入虚幻的神仙境界,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阿哈湖由此成为贵阳风景名胜之地,与黔灵湖齐名,所谓贵阳老城区“北有黔灵湖,南有阿哈湖”。

行走在阿哈湖西南部金山村的河谷乡道上,我们要去看的,是随阿哈湖泄水露出水面的两座“古墓”。古人择墓安葬,最忌水流穿过与淹没,此两座“古墓”最初自然是在山上,没入湖中是晚近的事。

若从上空鸟瞰,整个阿哈湖如一个张开的“鸡爪”。而穿过金山村的山路,便是“鸡爪”上的“筋脉”。顺着“筋脉”一路前行,楼房远去,草色顺着泽地成片绵延至湖面中,吃草的牛儿比路上的车还多,不知名的水鸟潜伏在草丛中鸣叫,一派风日洒然的田园野趣。

越往前,道路愈狭,景色愈幽,草色漫过路面。待抵达延伸进湖区“鸡掌心”处的老窝寨,就可隔着湖水,望见两处“古墓”,身心不禁为之静。

陶渊明确“心远地自偏”,其实“地偏心亦自远”,虽然此处离市区不过10多公里。在古代,阿哈寨周边未形成湖区之时,是晨曦罕至、沉默无闻的山野之地。

考察历代贵州贵阳的山水名胜志,有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《黔记》中的《山水志》,明曹学佺《贵州名胜志》四卷,以及民国年间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印的《贵州名胜古迹概说》,柴晓蓬先生撰写的《贵州文献季刊》(1938年—1939年第一、二、三期)的《贵州名胜志》,文通书局1948年1月出版的民国《贵州通志·古迹志》。以上史志,无一不枚举贵阳境内知名的山、水、洞、泉及亭台楼阁。1942年,贵州乡贤陈恒安先生在编写的《贵阳市指南》中总结了贵阳名胜的分布特点:“贵阳位于万山之中,四围皆见峰峦,波流较少,惟南明河一水蜿蜒萦回于其间,水曲山回,颇饶溪壑之胜。贵阳地既多山,与黔中各地相同,故其名胜,亦在山者多,在水者鲜。”但翻遍志册,阿哈寨一带的山和水并不单列成目,甚至只字不提。山且不论,黔地多山,号称山国,自是难以脱颖而出,贵阳城的名山属贵山、黔灵山、东山、扶风山、相宝山、南岳山、狮子山;而贵阳少水流,何以周遭5条河水不见单列提及?有两种可能——

一是山水景致并不出众的缘故。周边能称之为名胜而载诸志乘的,大概止步于小车河下游的白龙洞和大慈桥。小车河是南明河的支流,源于花溪区麦坪乡的红岩,与金钟河汇合处现已成为阿哈水库,下游在太慈桥附近的窄口汇入南明河,古称太慈水。明末,大旅行家徐霞客到过贵阳,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写道:“晨饭于吴,遂出司南门,渡溪桥,西南行,五里,有溪自西谷来,东注入大溪。有石梁跨其上,曰太子桥(即太慈桥)。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,冲突甚急,南来大溪遂不及也。”他提到的来自西谷、东注大溪之水即小车河。小车河南岸,有一个天然溶洞名白龙洞,洞内有暗河,岩壁上的岩溶沉积千姿百态,神奇而壮观,20世纪60年代将其辟为公园,民间把它叫作“地下公园”,因其在贵阳南郊又称之为南郊公园。

二是地理交通偏离城区的缘故。贵阳城建城很晚,元世祖至元十六年(1279年),贵山之阳的盆地上才响起了建筑城墙的夯土声,建成了贵阳有史可稽的第一座城池,名曰“顺元城”。贵阳城的扩展极其缓慢,已故贵州文化老人刘学洙先生在《贵州开发史话》一书中做过统计,从建设顺元城起至明天启六年(1626年)347年间,贵阳城区面积只增加了1平方公里;

和而不同 川流不息

阿哈湖寻古二三事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



1958年修建阿哈湖水库(图源:贵阳市档案馆)

阿哈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实施。正是因为水位下降,让两座水面下的“古墓”凸显了出来。

墓碑有两块,一块仅残存一半,碑文已无法辨识,碑后封土残损严重。另一块墓碑的雕刻较为古朴而繁杂,依稀可以辨识出“……上大夫龕……何公之墓”八个字,墓碑为整石打制,民间俗称“猪槽碑”,又称“神龕碑”,墓前左右的石华表,说明墓主人是有功名的。石华表上没有放置石狮子,四周也无一字,难以从中得到更多信息。在其中一根石华表旁,有一块长方形石头,石上开凿有直径二十厘米圆柱形的孔洞,石上不知道个中用途。

我们有着“事死如生”的丧葬文化。对亡者及其后人而言,墓碑如同逝者的一张“石质名片”,任意一处文字、雕刻或绘画,都是血肉神经,它关联着一个人的平生功德,也关系着一个家族的悠久来历、生死祸福、荣辱兴衰。不论平民还是贵族,都会有这样一张“名片”,百千年来默默伫立。墓碑作为墓上的重要标识,在隋唐开始有了规制的限定,墓碑和身份、地位相关联。经过明代更为严格的限制,到清代对墓碑上的题字也有了要求:品官墓碑书“某官某公之墓”,妇人书“某封某氏之墓”。八九品以下及庶人书“某官某之墓”,无官则书“庶人某之墓”;妇人书“某封氏之墓”,无封则称“某氏之墓”。

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相关专家对墓碑材质、碑文内容仔细研判,以及走访周边村民,核实该墓葬

为清朝晚期墓葬,且疑似在修建水库时已迁移,已无太多考古价值。但此处古墓暗含着一个隐形的信息点,即这是一个汉晋墓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,贵州被视为天荒之地。大山阻隔,使得这方土地上的不同族群,成为自行生灭、独立发展的封闭王国。这一点在丧葬习俗上有充分的体现,既有将崖壁上开凿出来的洞穴作为墓室的崖葬;有以宽阔的天然岩洞为墓室的岩洞葬;还有在悬崖峭壁上放置棺木的悬棺葬;也有贵州少数民族独特的“套头葬”。

后来,因从政、贬谪前来的士人,以及移民、经商而来的民众日多,黔中方成为一块以各民族移民为主体的土地,六百多年来,更有明初屯军、抗战内迁、解放西南、三线建设等多次以汉族为主的大规模迁入,从而形成了具有黔地特色的汉族主流文化形态。史学家史继忠先生为此把贵阳的文化特点归纳为八个字:“和而不同,川流不息。”得到了普遍的认同。阿哈湖周边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,这一处汉晋墓,既是阿哈湖区域不断融入贵阳城区的隐喻,也是汉文化和多彩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隐喻。

在贵州葬葬的大山间走得多了,就会发现一个规律:不论山有多大多偏远,只要看到坟墓了,就知道附近有住家户。山村里的“居”与“葬”,多数时候是在同一片空间里。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说,在贵州一些远古人类生活过的洞穴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墓穴,墓穴中有陪葬的石器和骨器,他们将器物与死者一起下葬,是希望逝去的亲人能够用上这些东西。洞穴既是居所,也是墓穴,考古界称之为“居葬合一”——生与死,早就这样陪伴在一起了;而在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内,出现了“屈肢葬”的墓葬形式:逝者的肢体是伸直的,古人类将逝者肢体卷曲、蜷缩后下葬;古人类认为死亡并不是离开世界,而是以婴儿的形式回到了母体——生与死,就这样循环往复着。

古墓所在的老窝寨,很多木房子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,但依然有人家静静地守在这里,一出门,便望得见一面湖水,一群山头。



阿哈湖古墓碑前的石柱(资料图片)